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开发”与掠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
沦陷区的经济统制

王士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赠书

(京)新登字 030 号

36 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王士花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3

(日本研究博士丛书)

ISBN 7-5004-1923-6

I. 开… II. 王… III. 日本-侵华事件-掠夺-史料-1937~1945 IV. K2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0793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5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12.00 元

序 一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所造成的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有人估算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具体分类数字，则尚无全面精确的统计。人们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暴行，往往只知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拉夫人，而知道日本军队屠杀中国人的却极少。至于日本侵略者究竟从中国占领区掠夺多少财产，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造成这种状况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中国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历史，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研究得不够。

几十年来，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在国共政治斗争的格局和思路中进行的。台湾方面的研究著作，对中共军队的抗日斗争往往小部肯定大部否定。大陆方面的著作长期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中共军队在敌后战场的抗战业绩，贬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抗日活动，很少甚至不敢于研究正面战场的得失。令人可喜的是，近十年来大陆史学界对抗战研究领域的研究，已有重大的拓展。其中对于日军侵华暴行和经济掠夺的研究已有若干论著问世。王士花所著《“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一书，可以说是这些论著中的力作之一。

有人问，我们的抗战史研究重点，应当放在何处？宏观考察，还是微观实证？我个人意见，应注重后者，加强微观研究。

所谓宏观，是指关系抗日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由谁指挥的？抗日战争有没有战略反攻阶段？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如何？等等。这些问题自然应该继续研究和讨论，但研究的重点应当是具体的实际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战

役和战斗的经过，日军的烧杀劫掠暴行，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等等。微观的研究透彻明了，宏观问题就有了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价的基础，否则就只能重复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这样的文章纵有千百篇，也无法使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更加真实、宏观、全面和科学。

王士花1988年由山东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蔡德金先生攻读硕士学位。她的硕士论文的研究以日伪对华北经济掠夺为重点。1991年，她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把研究领域从华北扩大到整个关内沦陷区，仍以揭露日伪对华经济掠夺为重点。其间，她以优异成绩获得1993—1994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留学日本良机。我特地邀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部长、著名的中国现代历史专家山田辰雄教授担任她在日留学期间的导师。天道酬勤，王士花学习勤奋刻苦，加上山田先生循循善诱，和日本学友们的帮助，使她的学业尤其是日语水平日臻精进。这使她能够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资料，充实和加强对这一历史课题的研究，并在归国后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其论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经济统制述论——以华北、华中沦陷区为中心》，在近代史学系学位委员会讨论通过时获得蔡美彪、王庆成、耿云志、从翰香、杨天石等与会专家们的一致高度评价。

中国史学界目前对抗战时期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研究刚刚起步，成果不多。《“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一书的不足之处在于史料方面尚需进一步充实，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大部尚在整理阶段而无法利用。这不仅关乎王士花个人的研究工作，而且关乎整个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受不向日本索赔观念的影响至深，以为既然不索赔，何必研究日本对华掠夺？事实证明，时至今日，日本国内还有极少数人逃

避历史，不肯承认战争罪责，而遭受其侵略的国家如果听之任之，一味加以容忍，那么悲剧就可能重演。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所造成的中国人民之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这笔帐应当彻底清算，不管你索赔或不乐于索赔。中国历史学者的责任，是通过自己的研究把日本侵华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凿实，使当年的战争罪犯永远无法遁形，使今天尚在逃脱罪责的日本国某些政界人士正视历史。王士花的《“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一书的公开出版，无疑是他们这一代年轻历史学者向当代和后代子孙作出的切实的交代和贡献。

陈铁健

1996年3月于北京

序 二

此论著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优秀成果。如何看待抗日战争及日中关系的历史，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要求我们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分析。

我早就认为，过去150年的日中关系史是由相互依存、竞存、敌对三个要素构成的，敌对关系就表现于战争、侵略上。抗日战争就是这种敌对关系的代表。那么，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什么呢？

无论怎么解释，日本的侵略是不可否定的事实。以往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主要焦点集中于战局、战争指导及战略战术等问题上，而对日军占领区日本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的分析和阐释，研究得还很不够。此论著是从资源、交通运输、金融三个方面对日本在华北、华中侵略行为进行系统分析的最初成果。在这个意义上，它开辟了抗日战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可以给予高度评价。

这项课题的研究，还蕴含着更广泛的内容。论著中分析的日军占领区社会经济变动与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关系、日本的侵略政策对其后中国社会的影响等等，作者在结论部分有所阐释，我希望作者能进一步加深这些方面的研究。

本书作者王士花于1993—1994年曾来到我的研究会进行研究，她的挚诚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日本研究生的尊敬和友谊。在本书中能看到她那时的观点和搜集的资料，这于我也是愉悦之事。

（日）山田辰雄

1996年夏于东京

前 言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除继续在中国东三省、台湾等推行殖民统治外，又通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侵入中国华北、华中等内地，对关内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军事侵略、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关于日本在台湾、东三省进行经济侵略的历史，中外学术界研究开始较早，成果较多。而对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情况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很有限，且不够深入。到目前为止，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虽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一般多为笼统的概述和部分专题性研究，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则很少见。如中国人民大学教师编写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材、董长芝所著《中国现代经济史》及陆仰渊等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等经济史著作，仅是在其中的几个章节里面作了一些概述。在论文方面，解学诗的《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满铁与华北的经济侵略》，民彦《“七七事变”前后满铁在华北的经济扩张》、徐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机构——华北开发会社》等文章，只就日本某些在华经济侵略机构进行了一些探讨。徐友春《日本在沦陷区的经济掠夺与政治统治》、吴钧善、戴惠珍《日本帝国主义对皖南农村的经济侵略》、单冠初《日本侵华的“以战养战”政策》、李秀石《论日本对我国华北和华中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等文章，也从某一个侧面、或针对不同地区对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情况进行了个别研究，而从总体上就抗战时期日本在关内沦陷区实施的经济统治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

日本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从 70 年代开始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如小林英夫《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占领政策——以其展开为中心》、铃木茂《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军管工厂与资源垄断》、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华北农业资源的过程(1937—1941 年)》、

原朗《“大东亚共荣圈”的经济实态》等文章,阐述了日本向华北进行经济渗透及其掠夺工矿、农业资源的概况。小林英夫的《“大东亚共荣圈”的形成与崩溃》、浅田乔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中村隆英《战时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治》和松本俊郎《侵略与开发——日本资本主义与中国殖民地化》等著作,也进行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具体史实的叙述和纯经济问题的分析,当然对全面了解日本侵华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我们认为,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现象,而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紧密相关。日本对华经济统制问题的研究,只有充分涉及到这些方面,才能做到不失之于偏颇。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关内沦陷区实行的经济统制,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一个侧面,也是抗日战争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全面地、历史地认清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内实施的经济统制政策、体制及其推行过程和实施状况等,有助于深入认识日本侵华的动机和手段,也有助于从经济方面来窥见和考察日本与傀儡政权的主从关系等等。而从上述学术界研究状况来看,待探明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日本在中国关内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与日本国内经济状况的联系;日本在华经济掠夺对于日本维持其战时经济所起的作用以及与侵华战争进程的关系;日本在中国关内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及其与军方的配合与分歧,等等,都须从整体上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探讨,某些方面还要进行专题性的深入挖掘和具体考察。有鉴于此,本书试图在这些方面作一些探索和努力。

笔者有幸于1993—1994年赴日研修,在此期间,曾多次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东洋文库、防卫厅防卫研究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等处,详细查阅了许多在国内无法看到的原始记录、档案和有关图书资料,解开了许多疑团,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基础。

从整体来看,日本在中国关内沦陷区的经济统制涉及许多方

面，但工矿资源是其掠夺的重点。日本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对沦陷区工矿业统制的，特别是与其侵略战争及资源掠夺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货币金融等部门，更是日本进行统制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关内沦陷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中。因此，本书拟以华北、华中沦陷区为中心，从工矿业、交通运输、货币金融三个方面考察日本在中国关内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的政策、机构、过程及实况，从中总结日本在华经济统制的特点，揭露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侵略政策的本质。关于日本在中国关内沦陷区农村进行的经济统制，将作为今后研究的课题。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简述日本对华经济统制政策的由来，第二章为日本对华北、华中沦陷区工矿业的经济统制情况的具体论述，包括其统制政策、方针的制定与调整，实施机构的设置与变化等。工矿资源掠夺与战争的进程紧密相连，因此第二章主要按日本侵华战争的进程，分三个时期逐一论述。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交通运输业和货币金融等方面，考察日本对沦陷区该行业实施经济统制的机构及状况等。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涉及到华北、华中两沦陷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日本实施的统制政策、方针和做法也有差异，所以，第三、四章在论述上采用按地区及布局进行研究的方法，即在横向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纵向考察，力图得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观点。最后一章（第五章）则在前面研究考察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并初步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华北、华中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的进程、变化及其特点，以及对战时日本和中国所带来的影响。

总之，本书根据尽可能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图较为全面、系统地探讨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日本全面侵华时期，在中国关内沦陷区实施经济统制的来龙去脉、组织体系、方针政策的确立、调整变化以及在工矿、交通、货币金融等方面进行统制掠夺的具体状况，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以战养战”政策的本质及其经济侵略手段的多样性和残酷性。

目 录

序一	陈铁健	(1)
序二	(日) 山田辰雄	(4)
前言		(1)
第一章 日本对华经济统制的由来		(1)
第一节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沿革及其国内统制		
经济体制的出现		(1)
第二节 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对华北地区的资本		
渗透及统制意图		(4)
第二章 “开发经营”与资源统制		(9)
第一节 战争初期对工矿业的统制 (1937 年 7 月—		
1938 年 10 月)		(9)
一、日本内阁第三委员会的设立与战争初期的		
统制政策		(9)
二、兴中公司与军管企业		(10)
第二节 对工矿业的全面经济统制 (1938 年 10 月		
—1941 年 12 月)		(16)
一、日本兴亚院的设立与沦陷区经济统制机关		(16)
二、华北开发公司的设立及其活动		(19)
三、华中振兴公司的设立及其活动		(30)
第三节 经济统制的强化以及工矿业统制形式的转换		
(1941 年 12 月—1945 年 8 月)		(37)
一、大东亚省的设立及重点主义的实行		(37)
二、统制形式的转换		(48)
第三章 交通运输统制		(54)
第一节 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统制状况		(54)
一、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及其机构		(54)
二、华北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的统制状况		(60)

第二节 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统制状况·····	(82)
一、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	(82)
二、华中铁道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状况·····	(84)
三、航运业的统制·····	(88)
第四章 “币制统一”与金融统制·····	(93)
第一节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与华北的金融统制·····	(93)
一、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设立·····	(93)
二、伪联银券的流通与“币制统一”·····	(97)
三、“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与金融统制·····	(100)
第二节 伪中央储备银行与华中的金融统制·····	(105)
一、日军占领初期的金融政策——军票的流通·····	(106)
二、华兴商业银行的设立·····	(112)
三、伪中央储备银行的设立及其金融统制·····	(116)
第五章 结论·····	(134)
第一节 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经济统制发展的 几个阶段·····	(134)
一、应急期(1937年7月—1938年10月)·····	(134)
二、经济统制体制确立期(1938年10月—1941年 12月)·····	(135)
三、经济统制强化及统制形式转换期 (1941年12月—1945年8月)·····	(136)
第二节 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经济统制的特点·····	(137)
一、统制机构的完备·····	(137)
二、军方的强力控制与配合·····	(138)
三、统制形式的欺骗性·····	(139)
四、典型的殖民掠夺·····	(141)
第三节 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经济统制的影响·····	(142)
一、对日本·····	(142)
二、对中国·····	(143)

附录	(146)
一、从“合作事业”看日本对华北沦陷区农村的 经济统制.....	(146)
二、藤原查察使报告书（节译）.....	(171)
三、中国关内沦陷区主要日伪货币流通量一览表.....	(185)
四、中、西、日年历对照表（1912—1945 年）.....	(187)
主要参考文献	(188)
后记	(194)

第一章 日本对华经济统制的由来

第一节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沿革及其国内统制经济体制的出现

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源于1894—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根据《马关条约》所定条款,日本从清政府索取赔款白银2.3亿两,利用这笔赔款扩充军备,设定各种基金,实施金本位制,一举完成币制改革。同时也为其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占领辽东半岛为其向中国北方扩张打下根基,并有利于巩固其在朝鲜的地位;而对长江航行权的获得,重庆、沙市、苏州、杭州内河港口的开放,对台湾、澎湖列岛的占有,又使其取得了向中国南方扩张的基地;特别是在华投资设厂一条,享受最惠国待遇,使日本与资本主义各国一样,其对华经济侵略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由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向中国东北的入侵暂时受阻;由于忙于经营台湾岛,对华南的入侵尚待时日,因此,当时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主要还是对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及长江沿岸诸开放港口的商业入侵。

1904年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侵略权益提供了大好时机。通过这场战争,日本从中得到了在中国东三省开埠、通商、筑路等特权。因此,日俄战后,日本对华贸易迅速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其对华贸易出口额由1893年的7714420日元急增为184496773日元,约是甲午战争前的24倍。^①同时,日本纺织公司钟渊纺织与内外棉开始进入中国,另有

^① (日)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27册,华中华南篇第一分册(1947年10月),第46页。

日本人以自办或合办方式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经营的铁工所、印刷、制粉等小型工厂。这时，日本虽没有对中国矿工业的直接投资，但以贷款的方式开始染指中国矿业。1904年，日本政府为确保对八幡制铁所的铁矿石供应，通过日本兴业银行向汉阳铁厂提供了300万日元的借款。由汉阳制铁所、大冶铁矿山、萍乡煤矿组成的汉冶萍公司，也是日本觊觎的对象，从1908年到1913年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取代兴业银行向其提供了3000万日元以上的贷款。^①

1906年6月7日，日本政府公布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条例，11月设总社于大连，设分社于东京，翌年4月1日正式营业。满铁是“日本特殊权益的重心”^②，也是完全由日本政府一手控制的国策公司，满铁的正副总裁、理事和干部都由日本政府任免，其业务、经营方针均由日本政府监督和决定，公司的资本总额半数由日本政府占有，至于其他一切事务无不受日本政府操纵。日本政府授予满铁公司广泛的职能，除铁路运输外，还准许其经营抚顺、烟台的煤炭采掘业、仓库业、电气业及其他事业。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稍后几年，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便乘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对华资本输出迅速增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是日本制造业者特别是纺织业者在华势力的迅速扩展。从1913年到1918年，日本在华纺织业纱锭数由233576枚增至423488枚，织机由3546台增至4346台。1918年，在上海新设2家纺织工厂，收买3家华人工厂，另外，1917年以来还在青岛新设2家工厂，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工厂共增至7家。日本片仓制丝资本也开始进入中国，着手

① 《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27册，华中华南篇第一分册，第52—53页。

② 郑学稼：《日本财阀史论》，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585页。

在青岛和上海经营制丝工厂。之后，日本纺织业的侵入一直呈扩大趋势。日本在华纺织业纱锭数从1918年的423576枚到1925年一跃增至1636156枚，增长近4倍，织机也由4346台增至11367台。其工厂增加了28家，公司增加了12家。^①其他各种工业，除扩大各地已有工厂规模外，在上海新设了烟草、皮革、造纸、铁工、化学、印刷等中小工厂及日华合办电灯泡制造公司，在汉口，新设了植物油、猪毛等土产精制工厂，在天津新设了烟草、面粉、肥料等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也攫取了在山东的开矿权，日华合办的鲁大（矿业）公司及日本出资的山东矿业公司相继设立。为日本资本的进一步扩张奠定了基础。同时，日本金融资本也进一步向中国扩张。继横滨正金、台湾两特殊银行之后，朝鲜银行也进入中国，在青岛、上海、天津、济南等地设立了支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间大银行住友、三井、三菱，也分别于1916年、1917年、1918年相继在上海设立支行，加强对华资本输出。另外，日本对华贸易也颇为兴盛。以上海为例，1917年贸易额超过1000万银两的有3家公司，最高的达5000万两。1918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超过10亿元，超过了曾经独霸对华贸易宝座的英国。^②

1927年到1928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先驱英国率先停止实施金本位制，国家经济体制也由自由经济体制向统制经济转变。随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脱离金本位制，并进入了经济体制的转型期。1931年4月，日本政府通过《重要产业统制法》，以图摆脱这场危机。由此，日本国内政治干预经济的统制经济体制开始出现。同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妄图通过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进一步向中国内陆扩张势力，以确立“日满华经济集团”，摆脱经济上对英美的

^① 《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通卷第27册，华中华南篇第一分册，第63页。

^② 同上书，第60—61页。

依存性，实现自己经济势力圈内的自给自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相抗衡。为达此目的，日本便不惜动用军事、政治、经济等所有手段，加紧向中国关内地区扩张。在此情况下，与东北相接的华北，成为日本下一步侵略的首选目标。

第二节 日本全面侵华前夕对华北地区的资本渗透及统制意图

中国华北地区人口密集，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它盛产小麦、棉花、盐、羊毛，蕴藏煤、铁等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原料基地。据当时的调查统计：华北五省煤藏量为1328亿吨，占全国的55.6%，尤以山西省最丰；铁矿储量约2亿吨；小麦，晋冀鲁察4省年达产1.1亿担；棉花约产330万担。^①对华北的丰富资源，日本早已垂涎三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一份密报中曾经露骨地指出：中国华北“将来在我帝国有计划之指导与经营下，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能大为增加，故华北诚为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②

华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而且作为伪满的缓冲地带，在军事、政治方面也有重要意义：日本如侵占华北可断绝中苏之联络，防止中国抗日力量进入伪满，巩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故日本声称要“使该地实质上成为巩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带”。^③为此，日本从1932年起，便开始对华北进行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入侵活动，同时加紧对华北地区的资本渗透，意在“输出”其经济统制政策。

① 国难资料编辑社编：《日本大陆政策的新面目》，上海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113—117页。

② 同上。

③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第361页。

1933年11月，满铁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查计划》。同年1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在天津、青岛等地设立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滦州、张家口、太原、济南等地设立办事处，专门调查开滦煤矿、井陘煤矿和冀东、山西、山东等地的工矿业与华北各种资源的供求关系等情况，^① 为日本向华北地区的经济扩张及日后实施经济统制政策创造条件。

1934年10月，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制订了《华北重要资源经济调查方针及要项》，提出了调查、开发华北资源的计划与方针；规定在华北掠夺的目标，是获取国防资源，强化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制；并准备组成“日满华北经济集团”。调查要项中把矿业资源放在重要地位，尤其重视华北的煤炭资源，他们认为：第一，华北“煤炭的质和量及分布关系有更大的价值”，为解决日本“一百年的燃料问题”，由日本来“开发”华北煤矿是“绝对的要求”；第二，“利用对煤矿的投资”最有利于日本在华北经济势力的确立。^②

1935年3月，满铁调查机关工作人员石井俊之也提出了关于《对华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的调查报告。报告露骨地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惟一现存的拥有最丰饶的资源和最大购买力的没被完全瓜分的落后国家。作为商品市场及廉价的原料产地，世界列强围绕其进行的政治性战争现也已进入了最后的阶段，为争夺资源产地，各国都倾向于采取孤立政策，建立各自的经济集团圈。“满洲的占领，就是‘结成亚洲集团’的第一步，作为‘结成亚洲集团’的第二步，提议华北的独立。”石井还特别注明，“华北”系指陇海路以北；所谓“独立”，即意味着将中国国民政府及其他外国势力排除于该地之外。然而，还不仅限于此，石井又指出：“但

^① （日）中村隆英著：《战时日本在华北的经济统治》，山川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② （日）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08—210页。